

古汉语词汇概要

赵克勤



责任编辑 仇宝如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古汉语词汇概要

赵克勤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萧山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39000 印数1—606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7346·476 定 价: 2.10 元

前 言

一九八〇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古汉语词汇问题》。这是我写的第一本小书，只有六万多字。在那本书里，我没有对古汉语词汇作系统地论述，只是把一些重要的、带有启发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有基本知识的介绍，也有对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探讨。那本书既不能说是通俗读物，也不能说是研究性的学术著作，因此名之曰《古汉语词汇问题》。出乎意外的是，那本小书问世以后，却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我想，这决不是因为这本书水平多么高，而是因为在当时还没有一本研究古汉语词汇的专著。我这本小书尽管不是专著，但“有”聊胜于“无”，因而也就谬承读者的错爱了；另一方面，也说明读者对研究古汉语词汇之类的书是非常需要的。要研究我国的古代文化，就必须掌握古代汉语这个工具；要掌握古代汉语这个工具，就要认真学习古代汉语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特别是词汇的学习更为重要。只要有那么一本谈古汉语词汇的书问世，读者也就饥不择食了。

《古汉语词汇问题》出版已经五年了。每当自己重读这本小书时，总感到不满意。不仅因为书中有不少错误和疏漏，而且也因为论述太简略，很多问题限于当时的条件和水平没能展开，于是萌生了修订再版的念头。一些朋友也建议：干脆打破原来的框框，写一本篇幅较大的、象样一点的关于古汉语词

汇的专著。这种建议虽然使我动心，但却不敢贸然从事。

一九八三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的第二本书《古汉语修辞简论》，一九八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三本书《古汉语修辞常识》。这两本书虽然是讨论古汉语修辞的，但也有不少地方涉及到古汉语词汇问题，因为修辞与词汇的关系在某些方面是十分密切的。在写这两本书的过程中，我对古汉语词汇的某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于是产生了新的想法：重新组织材料，写一本“概论”式的著作，以取代《古汉语词汇问题》。这样就产生了这本《古汉语词汇概要》。

《古汉语词汇概要》虽然问世了，也粗具规模，但我仍然不敢说它就是专著。这本书到底有多大分量，多高水平，那只有让读者来评定了。书中的内容，部分取自《古汉语词汇问题》《古汉语修辞简论》和《古汉语修辞常识》，但大部分内容是新加的；即使取自三本书的部分，对原来的论述也都作了较大的补充和修改。在书中，对古汉语词汇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可能有论述不周之处，更由于水平所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免，因此恳请专家学者及广大读者指正。

赵克勤

一九八五年十月于北京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单音词	12
第一节 单音词为主是古汉语词汇的主要特点	12
第二节 古汉语单音词的特点	14
第三章 复音词(上)	27
第一节 复音词的形成与发展	27
第二节 复音词与单音词的关系	46
第四章 复音词(下)	52
第一节 复音词的分类	52
第二节 并列复音词	54
第三节 主从复音词	60
第四节 连绵字	67
第五节 重言词	73
第五章 词 义	80
第一节 本义	80
第二节 引申义	86
第三节 古义与今义	94
第六章 词义的演变与发展	106

第一节	词义发生演变的原因	106
第二节	词义演变和发展的各种情况	114
第七章	同义词	129
第一节	同义词的形成与变化	129
第二节	同义词的运用	142
第三节	同义词的辨析	154
第八章	反义词	162
第一节	古汉语反义词的分类	162
第二节	反义词的特点	174
第三节	反义词的运用	179
第九章	同音词、同形词和多音词	186
第一节	同音词	186
第二节	同形词和多音词	193
第十章	通假字	199
第一节	“本无其字”的假借	199
第二节	“本有其字”的假借	205
第三节	通假字的确定	213
第十一章	古今字	221
第一节	历代训诂学家关于古今字的不同解释	221
第二节	古今字的产生及其与通假字、同源 字、异体字的关系	225
第三节	应该正确认识古今字	235
第十二章	古书材料及训诂学研究成果的 运用	242
第一节	关于原始材料的运用	242
第二节	《尔雅》和《说文》	245

第三节	古书的注疏	253
第四节	古书材料、训诂学研究成果与词义的 确定	262
第十三章	古汉语词汇研究与古汉语字、词 典的编纂	269
第一节	传统训诂学与字、词典的关系	269
第二节	古汉语字、词典的释义原则	270
第三节	古汉语字、词典义项的确立和分合	278
附录一	古书常用通假字举例	285
附录二	古书常用古今字举例	311

第一章 绪 论

研究古汉语词汇，首先就得从字谈起。在传统语言学中，字与词的区分是不大严格的。传统语言学家所谓的字，往往就是词。马建忠著《马氏文通》，把词统统称之为字，如称“名词”为“名字”，“代词”为“代字”，“动词”为“动字”，“连词”为“连字”，“助词”为“助字”，等等。书中也有称“词”的，那是指比词更高一级的概念“语”，如称“主语”为“起词”，“谓语”为“谓词”，“宾语”为“止词”，等等。实际上，字与词之间并不能划等号。字是书写符号，是组成词的要素，而词则是最小的能够独立活动的有意义的成分。有些字本身就是词，如“天”“地”“人”“民”“水”“火”“大”“小”等；有些字本身不能成为词，必须与别的字合在一起才能构成词，如“葡萄”“蟋蟀”“玻璃”“苜蓿”等连绵字，都只能看成一个词，而“葡”“萄”“蟋”“蟀”“玻”“璃”“苜”“蓿”等字，都不是词。有的字在有些情况下是词，在有些情况下又是字。如“参”，当“参与”“弹劾”讲是词，因为它能独立活动，而且有意义，符合词的条件；但在“参差”里则是字，因为它不能独立活动，没有意义，只代表“参差”这个连绵字的一个音节。有些组成双音词的字虽然其本身有意义，但它们只能看成这个双音词的一个语素，而不是词。如“天子”“诸侯”，“天”“子”“诸”

“侯”四字都有意义，但它们只是作为这两个复音词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出来，一独立出来，就与它们组成的复音词的意义不同了。吕叔湘先生指出，字的地位大致可与语素相当^①，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当然，连绵字里的单字应该除外，因为语素虽然不是词，但它有意义，连绵字里的单字则没有任何意义。

在古汉语中，由于单音词占多数，往往一个词只由一个字构成，所以字与词的界限就很容易混淆。知道了这个情况后，我们就会明白：当古人讲字的时候，往往讲的就是词，切不可用现代的观点去理解它。另外，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也常常要从字入手。如分析词义要从字形入手，如果拘泥于字词的区分，那就有很多问题不好谈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完全忽略字与词的界限。应该说，有时候可以忽略，有时候又不可忽略。在古汉语中，一个词可以由一个字构成，但一个字往往不只代表一个词。如“豆”是一个字，却代表了两个同音同形词：一是俎豆的“豆”，是一种食器（《孟子·告子上》“一箪食、一豆羹”）；一是豆子的“豆”，是一种农作物（杨惲《报孙会宗书》“种一顷豆，落而为萁”）。又如“卒”是一个字，却代表了三个同音同形词：一是名词“步兵”（《左传·隐公元年》“缮甲兵，具卒乘”）；二是动词“死”（《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晋文公卒”）；三是副词“终于”（《战国策·赵策》“卒为天下笑”）。同样，词义有时候可以等于字义，但在多数情况下却不等于字义，而是小于字义。上面举的“豆”“卒”两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再进一步说，词义的演变并不等于字义的演变。例如叔父的“叔”，

①见《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4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6月出版。

是由表示排行在后的“叔”引申来的。古人用伯、仲、叔、季表示排行，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因为叔父的排行在父亲之后，因而“叔”又引申出“叔父”的意思。由表示排行的“叔”变为叔父的“叔”，只是“叔”这个词的词义演变，而这个演变并不等于“叔”这个字的字义演变。作为字来说，“叔”的本义是拾取：《诗经·豳风·七月》“九月叔苴”（苴：音ju，麻籽），就是用的本义。由本义假借为排行在后，这个假借义又引申出叔父。由此可见，“叔”作为一个字的演变是这样的：先由本义派生出一个假借义，再由假借义引申出另一个意义，本义与假借义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词多义的关系，而是两个同音词的关系，也就是一字多义的关系。有些研究古代汉语的书，由于忽略了字与词的区别，进而也就忽略了词义与字义的区别，把一词多义与一字多义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从而用词义的演变来代替字义的演变。如有一本介绍古汉语基础知识的书，在“怎样掌握一词多义”这一节中说：“一个多义词的几个意义如果毫不相干，而且也不是本义引申义的关系，那它必定有的意义是假借义。”^①所谓多义词，也就是一词多义，它的几个意义之间必然是有联系的，绝不可能有假借义存在；如果有假借义存在，那就不可能是多义词，而是同音同形词了。我们在前面举的“卒”字，它主要有三个意义。从“字”的角度说，是一字多义，从“词”的角度说，却是三个意义各不相同的同音同形词。但有的书却把“卒”的这种情况称之为一词多义^②，这种提法也就是将字等同于词的结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吸收

①见《古汉语基础知识》1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

②见《古代散文选》上册附录《文言文在字、词方面的问题》391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出版。

了某些古汉语教科书“常用词”部分的研究成果，在释义方面具有更加简明和准确的特点。但我们认为，编者将“常用词”改为“常用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常用词”各个意义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是同音同形词的关系，称“字”不称“词”是较为科学的。

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是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因为古汉语词汇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古今汉语词汇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共同的东西体现了古今词汇的继承，不同的东西体现了古今词汇的发展。例如汉语基本词汇的构成，古今汉语基本相同，只不过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更丰富一些罢了。正因为如此，古今汉语词汇才成为分割不开的整体。然而，只看到相同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相异的一面。例如，古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复音词为主，这就是很大的不同。单音词具有多义、灵活的特点，复音词在表达意义方面则比较准确、明白（这个问题后面有专门论述）。古汉语单音词的多义性，给我们带来了选择的困难；灵活性又给我们带来了识别的困难。这就是“异”，这就是古今词汇的差别，这就是古汉语词汇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汉语中，很多基本词汇如山、水、花、草、牛、羊、猪、马、长、短、宽、窄等，古代是那个意思，现代还是那个意思，没有什么变化。（有些基本词古今使用的范围和条件有所不同，如古代人个子矮可以说“短”^①，现在“短”没有这种用法，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这正是现代汉语继承古代汉语的主要方面。然而，只注意不变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变的一面。实际上，古汉语词汇差不多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随

①《荀子·非相》：“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改变，以及整个历史的演进，古汉语词汇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新词的不断产生和旧词的不断死亡，这是变化的一个方面；新义的不断产生和旧义的不断死亡，这是变化的另一方面。当然，这两个方面绝不是变化的全部内容。研究古汉语词汇，就是探索它的特殊规律，研究它的变化发展，搞清它与现代汉语词汇的主要差别。特殊规律摸清了，变化发展掌握了，古今词汇的主要差别找到了，我们对古汉语词汇的面貌才可能有比较全面而深刻的认识。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就有必要建立古代汉语词汇学，以区别于现代汉语词汇学，同时，使之成为汉语词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汉语词汇学应该是一个完整的学科，应该有它特定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研究任务，应该有它自己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它应该不同于从纵的方面来研究汉语词汇历史发展的“词汇史”，而应该以古汉语词汇的特殊性为出发点，从纵横两个方面对我国丰富的古代书面语进行综合研究。目前，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而古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起步。有关古汉语词汇的单篇论文当然有一些，但有分量的专著实在太少了。因此，把这一学科建立起来，就要靠学术界的共同努力。

研究古汉语词汇，是以古代语言为材料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只能通过古代典籍来了解古代语言的情况。古代典籍，包括政治、历史、哲学著作以及由散文、韵文和诗词歌赋构成的文学作品，虽然是由书面语言记录的，但却基本上反映了古代语言的实际情况。根据这些书面语材料得出的结论，应当说是可信的，如果没有这个基本认识，研究古汉语词汇就是一句空话。然而，这并不是说，凡是古代书面语材料，都可以不加分析地随便运用。“古代”包含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可以分为上古、中古、近古。按照习惯的划分标准，古代汉语可以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几个阶段，各个阶段都有它一定的特点，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词的具体含义以至某些词语的构成方式都可能有所不同。因此，研究古汉语词汇，必须建立“时间”观念，也就是历史观念。很多问题应该放在历史发展中来讨论。例如后面要谈到的“古义”与“今义”，“古”和“今”就有很多讲法。有些是以古代与现代（或近代）来划分的：例如“穷”，古代指境遇不好、走投无路或仕途不得志、政治主张行不通，近代指贫困、没有钱，古义与今义相差很远。这就是说，“穷”由古义转为今义，是近代的事，“今”指的是近代。有些则不能笼统以古代与现代（或近代）来划分：例如“行李”，先秦指使者。《左传·僖公三十年》：“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到了唐宋，“行李”转指旅行者随身所带的衣物。白居易《李卢二中丞各创山居……偶题十五韵聊戏二君》诗里有“矻矻事行李”（矻：音kū。矻矻：极度劳累的样子），苏轼《与程德孺运使》里有“当遣儿子迈往宜兴取行李”，都是这个意思。这就是说，“行李”由古义转为今义则在唐宋时期。那么，“古”当指先秦，“今”则应指唐宋。当然，时间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把握的。我国古籍浩如烟海，如果见之不广，察之太疏，就容易作出失真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青”，古代多指“蓝色”或“绿色”，《荀子·劝学》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刘禹锡《陋室铭》有“草色入帘青”。现代汉语里“青”却可指“黑色”，如“青布”即黑布，“青衣”即黑衣。问题是，“黑色”这个意思是否古代就有。根据古书的材料，“青”在古代也可指“黑色”，《晋书·阮籍传》记载，阮籍善为青白眼，“青眼”就是指黑眼珠。李白《将进

酒》：“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青丝”即黑发。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部分“青”初版只列“蓝色”一义，并断言“古代青字不当黑色讲”^①。一九八一年出版的《古代汉语》（修订本）改列两义：（一）蓝色，（二）黑色。结论也作了相应的修改：“在古代汉语中（尤其在上古），青多用（一）义，（二）义少见。唐宋以后（二）义渐多。”两种解释，两种结论。前者之所以错误，主要原因在于失察，根据片面的材料作出了武断的结论。《修订本》考查了更多的材料，发现了原书的疏漏，作了必要的改正。这当然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这件事给我们一个启发：研究古汉语词汇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要给词义作出“时间”上的判断，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除了要作历时的、纵向的比较之外，还要作共时的、横向的调查。只有这样，才能摸清一个词的正确含义以及它的各种变化，得出准确反映该词面貌的结论。

古汉语词汇有一些问题是某一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例如古代因为避讳而把古书中的一些字改成读音不同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有些常用词语被弄得面目全非，叫人难以读懂。这种词语的变化，纯粹是古代统治阶级干预的结果。例如《后汉书·应劭传》“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又《王符传》“化国之日舒以长”，一个“时化”，一个“化国”，如果不知道这是避讳的产物，简直就不知所云。“时化”当为“时治”，“化国”当为“治国”，因避唐高宗李治讳，将“治”改成了“化”。《旧唐书·高力士传》“宝应元年三月，会赦归，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国事，始知上皇厌代”，“厌代”当

^①见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1273页。中华书局1964年出版。

为“厌世”，语出《庄子·天地》：“千岁厌世，去而上仙。”本意为厌恶人世，因后句是“去而上仙”，遂以“厌世”为死的委婉语。《旧唐书》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将“厌世”改为“厌代”，则令人不知所云了。类似这种由于行政命令或少数人主观意志而使词改变了用法或面貌的情况，只是特例，不是常例，并不具有典型性。研究古汉语词汇，应该把重点放在那些具有典型性的问题上，我们的结论主要应该反映古汉语词汇在其演变发展中的普遍规律，反映主要的、本质的现象。当然，对古代那些特殊的语言现象，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这些特殊现象对古汉语词汇毕竟是产生过影响的。

古汉语词汇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与语言学范畴内的许多学科都有关系，特别是与语法、修辞有着密切的关系。

先从语法方面来说。字与语素的区分，语素与词的区分，复音词与词组的区分，词的构造方法，词性的确定，词缀的作用和性质，等等。这些问题都具有双重性，语法学要讨论它们，词汇学也要讨论它们，只不过讨论的角度不同罢了。例如语素问题，语法学是把它作为语法系统的基本符号来讨论的，研究它们的结合能力以及结合后的位置；词汇学是把它作为词的构成要素来讨论的，研究它们的构成形式以及语素义与词义的关系。但不管角度怎么不同，把语素看成语言的一个最基本要素是共同的。有些语法现象是经过词性的变化以后产生的，我们似乎也不能把它们排斥在词汇问题之外。《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所谓生死而白骨也。”“生死”，指使死者复生；“白骨”，指使白骨长肉。“肉”由名词转化成动词，包含有“使……长肉”的意思。从语法方面说是使动用法，从词汇方面说是“肉”的意义的发展。《韩非子·五蠹》：“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高”原是形容词，转化成了动词，包

含有“认为……高尚”的意思，是一种意动用法，但从词汇方面来说，则有推崇的意思。类似这类问题，说它们属于词汇范畴也未尝不可。

再从修辞方面来说。修辞虽为一种表现方法，但实际上也是词汇在运用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某些修辞手法的运用，常常能引起词义的变化。例如“玉”的本义是玉石，人们常常拿它来形容某些美好或珍贵的事物，最初无非是一种比喻；后来，美好、珍贵实际上成了“玉”这个词的新义：“玉音”指美好的言词，“玉食”指珍贵的食品，“玉容”指美丽的容貌，等等。如果仍坚持用比喻来解释，一律说成“象玉一样的”，反而不容易被人们接受。“虎”可以指勇猛，如“虎劲”“虎将”；“牛”可以指固执，如“牛劲”“牛脾气”。这些新义的产生，都是运用比喻的结果。又如“元宵”，本来是节日名称，指夏历正月十五日的夜晚。古人习惯在元宵节吃汤圆，于是便用“元宵”作为汤圆的代称。现在北方人单说“元宵”，就是汤圆，如果指节日，则须加一“节”字，说成“元宵节”，否则听的人便会产生误解。“大夫”在古代是官名，因为宋代医官设有官阶，分为大夫、郎、医效、祇候等，于是“大夫”便成了医生的代称。作为官名的“大夫”已经死亡，而作为医生的“大夫”，却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现代汉语中保存了下来，只不过读音变了，不念dàfū而念dài·fu。可见“元宵”“大夫”新义的产生，是运用借代这种修辞方式的结果。古汉语词汇与修辞的关系，也表现在复音词的形成与发展上。古汉语复音词的形成有各种各样的途径，而修辞手法的运用也是一个重要的途径，这个问题在“复音词”一章里还要谈到，这里就不详加论述了。

研究古汉语词汇，不能不提到训诂学。训诂学是以考释古书

词义为主要对象的学科。我国古代的训诂学门类繁多，内容复杂，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为读通古书的需要，对古书逐字逐句进行诠释的古代注疏；一种是把古书里需要解释的字、词抽出来并用一定的方式加以编排，然后进行语义通释的专著，即古代的字书和词书。由此看来，训诂学的主要内容是对古书的词义进行诠释和研究，这就是古代的语义学，古代的词汇学。我们研究古汉语词汇，必须充分利用训诂学的研究成果。但是，训诂学的内容是相当庞杂的。就以古书注疏来说，除了解释词义、串讲文意、考证古音古义等与词汇有直接关系的内容外，还有分析句读、阐述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考证史实、记述山川、介绍典章制度等内容。显然，很多内容远远超出了词汇学的范围。因此，我们在利用训诂学的研究成果时，还必须加以选择、分析和鉴别。另外，由于缺少理论指导，古人对于古书字词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就需要我们对其有用的部分，用新的方法加以整理和提高，使之成为古汉语词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训诂学的研究发展很快，这方面的成果也日见增多，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我们认为，首先，训诂学的研究要摒弃门户之见，对各派的观点兼收并蓄，这样才会有广博深厚的理论基础。其次，训诂学的研究不能墨守成规，走前清小学家的老路，要建立新的体系。对于过去的研究成果，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使之科学化、系统化。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训诂学获得新的生命。第三，训诂学不应只停留在研究古人释词的方法、条例上，也不应仅仅研究词的本义、引申义和假借义，还要找出词义发展演变的内部规律。王力先生早在一九四七年发表的《新训诂学》一文中就提出了建立“新训诂学”的主张，他指出：“旧训诂学的弊病，最大的一点乃是崇古。